



# 来自中国的挑战：审查与控制的变化动力

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调查报告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前言：矛盾之国

作者：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

阅读有关中国和媒体的报道，令人集中注意到当今中国的大量矛盾，这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有效。

与我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时的情况相比，当今活跃的中国媒体和新闻环境是我万万想不到的，这令我惊奇不已。但是与保护记者委员会倡导的、更为重要的是，与日益增多的中国自己的互联网公民、新闻工作者与普通公民信仰的言论自由的理想相比，中国的媒体与新闻环境则相差甚远。

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产生了近六亿互联网用户、四亿以上的手机用户和超过三亿的微博用户。仅每时每刻产生与分享的内容和传播的数量就非常令人吃惊。

即使在最近的过去，大多数这些内容，例如尖锐的评论、报道、图片和有关腐败的笑话，食品安全，交通状况、冒险的交易、滥权和许多其他挑战性的话题都是难以想象的。地方报纸和杂志试图突破对报道、编辑甚至评论的限制。

国外有关中国的报道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成为国内辩论的一部份。

与我 1990 年代在中国担任路透社分社长时相比：进入办公室将一堆堆省报砰然丢在书桌上，然后沉闷地阅读每份仿佛和官方“路线”保持一致的报道。异议人士当时没有微博试图传送挑衅性或者近于胆大的信息，当时他们最多只有一个公用电话。

中国已经有了巨大、明显与可以感觉得到的进步，不过，正如环绕院墙的电篱笆一样，到处都可见宽容和自由受限的证据，阴森恐怖并非好兆头。

任何过于大胆的人都受到威胁、骚扰、甚至逮捕。任何太具煽动性的信息都会消失。任何走得过远的新闻工作者都会被强拉回来。任何越线的出版物都会感到官方坚持己见的沉重压力。创造内容和创新发现的伟大工具互联网四周全是难以穿透的长城防火墙，使得热门话题不成话题，新闻人物突然消失，而国家权力成为无所不在的幽灵。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随着中国不断的变化，其人民对于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多的预期，而这些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写入神圣的中国宪法。

该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并非这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也不是在纽约发表、对西方受众与团体关注的问题具有某些特别意义的报告。该报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关媒体权利和言论自由受限制这一重要讨论应该在中国进行，因为这最终涉及近六亿互联网用户、四亿以上的手机用户和超过三亿的微博用户中的每一个人，任何时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政治路线的改变而发现自己站错了队。

保护记者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史进德是设在香港的媒体与中国咨询服务公司史进德顾问有限公司 (Tripod Advisors) 创始人和常务董事。他曾担任路透新闻全球总编辑与汤森路透中国区主席。

## 1. 超越审查，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

苏菲·比奇

2012年3月24日，调查记者杨海鹏在新浪微博上就他听说的消息发表文章，称发现了在重庆一家旅馆死亡的英国商人尼尔伍德（Neil Heywood）和强势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他的帖子被广泛认为是首次显著公开提到尼尔伍德和薄熙来之间关系的文章，在网上如野火般传播，但第二天就被删除。一个月之后，杨拥有24万7000粉丝的新浪微博账号被封锁。

杨的经历说明互联网在中国倡导言论自由的威力与局限性。杨发帖没有几天，全世界都知道了伍德、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之间的关系；谷后来因谋杀伍德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而薄熙来则被开除出党，面临刑事指控。但是广受尊重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博客杨海鹏至今仍然不能在中国最流行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与粉丝们自由交流。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媒体环境随互联网爆炸性的成长而发生了改变，自从2010年以来，微博吸引了3亿900万用户。微博创造了一个新的网路生态系统，微博上随时都有新闻发表其传播速度远超审查者封杀的速度，因而能够影响公众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和政治反应。有关2011年温州高铁出轨造成40人丧生的消息最先就是在微博上传播的。据商业资讯公司CIC与奥美公关公司发表的白皮书，当年微博上有关此事的贴文多达450万条，其中大多数都批评政府未能很好地处理此灾难。部分由于该原因，政府颁布了高铁系统更加严格的安全规则。虽然中国政府以防止社会不稳定为由控制媒体和互联网，但是温州高铁事件无疑成了更自由的言论在中国有助于提升公众兴趣的例证之一。

但是，虽然微博在中国公共场合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自由和开放许多，微博讨论的主题仍然受到严格管控。贴文被审查、账号被关闭，搜索敏感的政治内容结果被过滤。传闻扩散被用来证明对不受欢迎的内容进行广泛镇压是有道理的。微博用户一直受到质疑，偶尔还会因为他们发表的内容而系狱。

保护记者委员会曾通过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转交温家宝总理办公室书面询问对该报告的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复。

北京明显看出促进通讯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一方面封杀诸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全球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一方面鼓励国内发展类似的网站以推动成长和创新。其结果给人的印象深刻：出现了特征突出、对用户友好、极为流行的平台新浪微博和诸如拥有中国第二大微博平台视频分享网站优酷网的腾讯和类似脸书的社交网络人人网和开心网等其他社交媒体网站。

不过这些公司也颇感左右为难，因为一方面用户通常要求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审查当局要求他们自行审查其平台不然就面临失去营运执照的危险。达不到政府要求的公司在市场上表现不佳：例如饭否网站，这一中国早期的微博平台，因为用户张贴有关新疆乌鲁木齐的暴乱于 2009 年至 2010 年间被关闭 16 个月。北京 Sinocism 新闻信编辑比尔·比舍普（Bill Bishop）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新浪名列前茅除了能够开发出不错的产品外，还因为“与饭否网不同的是，它知道如何行事才能讨好政府。”

微博平台使用各种方法来满足政府的审查要求。过滤关键词是限制内容使用得最广的方法。有些关键词能够完全阻止某一帖子的发表；其他一些关键词将其标识后供编辑审查，还有一些关键词在这些平台的搜索引擎上则完全不能搜索到，导致难以进入这些帖子。中国数字时代搜集并整理出了一个被新浪微博封锁的搜索关键词名单，自从 2011 年 4 月以来被新浪微博封锁或临时封锁的关键词共约 2000 个。此外新浪微博用户经常报告他们的贴文发表后只有作者自己能够看到，因此可能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审查。

如果用户不顾这些过滤技术发表禁忌的主题贴文，其账号可能被暂时关闭以示警告，如果反复违规则会永远被禁。据网路上披露新浪管理层的一个内部通知说，任何“有害”信息一旦贴出，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删除；被封锁但仍然拥有账号的用户所发帖子，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发表。此外，微博服务供应商必须给公安部门提供进入网络后端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直接输入被封锁的关键词并立即删除影视和照片。自从 2012 年 4 月其账号首次被关闭后，杨海鹏至少尝试了 65 次，以各种用户名重新开设新浪微博账号，但每一次都被关闭。

据香港凤凰周刊自从 2012 年 3 月发表后在中国网路空间广为传播的详细披露，新浪创建了一个与前述关键词过滤系统配合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利用相关技术搜索被封杀的关键词。第二层利用人工审查拟发表的内容，然后将相关内容提交给第三层。第三层的工作人员追踪当前的事件，以帮助前端人员改进并更新他们封杀的关键词名单。2011 年 3 月新浪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对福布斯说，新浪聘用“至少一百人”，从事人工审查工作，但普遍认为这是被低估的数字。

新浪还设有对某些事件做出针对性回应的机制。据凤凰报道，新浪有一支至少由 600 人组成的队伍，这些自愿者都能被组织起来，对如温州高铁列车出轨等紧急情况作出反应。该团队包括新浪现有员工，前编辑和临时工等。据该报道，新浪在新浪社区公开招募这些“后备力量”，雇用那些平时“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用户。换句话说，积极发帖支持政府网路监管政策和实践的微博用户会因此得到奖励，被邀请参与新浪团队。

这与新浪 2012 年采取的一项新政策是一致的。根据该政策，用户以信用积分的方式奖励或者惩罚其他用户。据 2012 年 5 月新浪微博社区管理中心发表的通知，对提供个人信息的用户奖励信用积分，如果用户散发“不实”信息或者进行人身攻击，则被扣分。如果用

户的积分降至零则其账号将被关闭。但是“不实”信息的定义则掌握在审查者手中，他们利用这一定义来界定政治上不对味的贴文。

信用积分制及注册实名制的执行不大一致。2011年12月，北京市政府颁发规定，要求微博供应商收集并在2012年3月之前确认在其平台上公开发帖的所有用户的真实姓名。该规定一旦完全执行，网路论坛倍感凄凉，因为大多数微博平台的自由源自用户匿名。但是，根据新浪2011财政年度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报告，该公司承认，并不能完全执行该规则，“原因包括现有用户的习惯、微博产品的性质，以及缺乏明晰的具体实施步骤。”在该报告中，新浪表示，“我们的违规行为有可能使公司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处罚”。201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实名制注册扩大到包括移动电话公司在内的所有提供网路服务的公司。

当局并试图通过雇用大量互联网评论人在微博和其他网路论坛发表亲政府的帖子，以引导网路交谈。互联网用户给此类评论人的绰号是“五毛党”，因为传闻这是他们发表一个帖子所获的报酬。在2012年10月《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访谈中，艺术家及纪录片制片人艾未未采访了一些“五毛党”成员，这些人承认，高达20%的网路论坛评论是受雇的评论人所为。



微博为中国互联网用户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场合，这正在使全国交谈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互联网用户一般是城市人口，受过教育并属中产或者上层阶级。虽然用户可能对审查表示不满，但许多人也认为，这是新浪为能够生存下去而支付的代价。Sinocism的比舍普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是的，用户不满意新浪的做法，部分将他们当作发泄对政府不满的出气筒，但是精明的用户知道，新浪已经大大扩展了论坛的界限。如果他们不能让政府高兴的话，则其服务将会成为中性或者更糟糕。”

尽管互联网公司对政府审查者有义务，但这些公司仍然有一些巧妙的方式推进言论自由。2013年1月，在回应有关该公司审查帖子批评时，新浪微博的一位经理解释说，即使在审查的范围内，信息仍然在被删除之前快速传播。他写道：

你们一通狂发之下，“小秘书”一通删，但有无阻碍你们看到信息？如果不删单条微博，[他们]直接将用户封停账号。[.....]事实上，事发前和事发之初，其实就已经在承受着压力，但能抗住，让所有信息散播出去，已经是很艰难的胜利了。

在某些情况下，站在用户一边推进言论自由将使公司具有竞争优势。2012年6月，新浪网关闭了拥有大约四万粉丝的著名博客和言论自由倡导者毛向辉的账号，因为此前他发表了批评中国太空计划是浪费资金的文章。新浪告诉他，因为这是“有关当局”的命令，这是新浪不能控制的，因此他没有追索权。结果，腾讯邀请毛到其微博开设账号。他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他相信这是略胜一筹的竞争行动。如今他在腾讯微博上已经有了一万粉丝，但他并不活跃，他承认在新浪的经历后他更加小心谨慎。

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微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以发表不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信息，其中包括审查指示等。中国的宣传当局传统上严格限制新闻工作者报道他们的指示，这些指示通常被定义为国家机密。湖南新闻工作者师涛在网路上传递政府的宣传指示后，于2005年被判监禁10年。现在记者们通常在网路上匿名发表审查指示，在审查者删除之前，这些信息已经扩散。据卡内基美隆大学研究人员调查，这些被泄露的指示已经非常普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开始将它们称为来自真理部的指示，暗喻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真理部。结果“真理部”也成了微博上经常被删除的词汇。

不过即使在被严格审查的中国搜索引擎百度上，用中文搜索“真理部”仍能产生约18万8000个词条。（*中国数字时代*收集并定期翻译真理部指示。）

微博也给予新闻工作者在反审查方面加强团结的力量。2013年1月，在当地宣传部门单方面用亲政府的信息替换该报倡导宪法及尊重法律的新年贺词后，广州思想独立的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举行罢工。由于不满审查者过度干预编辑过程，编辑们利用微博呼吁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全国各地的报纸、个人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互联网用户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利用他们的微博，号召支持南方周末并为新闻自由呐喊。在电影明星和主流媒体在他们的网站和微博上发帖明确表示或者暗示支持后，此事很快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互联网用户能够接触更多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信息，网路讨论的调子也发生了变化。几年前，中国网路上声音最大并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来自“愤青”。该词指的是唧唧叫喊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后来在其他社会问题占据主导地位 and 互联网越来越允许范围广泛的声音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大学著名媒体教授胡泳认为，2008年是转折点。他2012年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写到，民族主义的议题越来越让位于关于民生的议题。现在人们上网是为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看到中国社会腐败、滥用权力与环境退化等问题的公民团结一致。胡泳在上述文章中写到“风向在发生变化，当你的孩子不能喝上安全奶、不能坐上安全校车，当你出门就餐会吃上地沟油，当你居住的城市雾霭沉沉、你无从知晓PM2.5 [衡量空气质量的指标]的真实含量时，你会更关心中国社会何处去、中国人民怎样才能幸福的问题，而不是打打杀杀的义和团主义。” [1900年暴力反对外国人的起义]。这种情况在2012年9月钓鱼岛争端发生后，在中国各城市兴起的反日抗议活动中较为明显。在街头，政府批准的示威不断加温，并经常演变成暴力，因为抗议者一致谴责日本甚至呼吁战争。



在网路上，相关讨论则更加多元化，许多互联网用户对抗议者和政府鼓励他们的角色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一位微博用户写到，“其实我最大的疑问是钓鱼岛是中国谁的？反正肯定不是我的，也肯定不是你的，也许是‘人民’的吧。”

互联网用户现在感到在反抗官方宣传方面拥有更大的力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经常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民族主义与亲政府的观点。他的每一篇微博通常会引来数百甚至数千个严厉批评其立场的评论。通常，在政府对某一重要问题发表看法时，互联网用户往往会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政府的信息。有些微博用户翻墙阅读并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的推特上就每日空气质量回帖，开始大声质疑中国政府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显示的污染严重情况大大低于实际。当北京 2012 年 6 月宣布美国大使馆收集空气质量是非法行为时，微博用户大为不满。对该问题的关注最终有助于推动某些中国城市提供更为准确的空气数据，2013 年 1 月，政府公布了一个将提供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的网站。同时也在 1 月，当笼罩中国北方和华中地区的污染达到创纪录高峰之际，新华社和其他官方媒体改变了对该问题的态度，以特别透明的方式报道污染的程度、原因以及寻找解决方法需要公众监督等。

网路变化的动能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仍然不允许新闻自由报道具有地方和全国性重要意义的问题。缺乏可信任及正当的新闻来源，这一真空往往被无确实根据的报道，半真半假的新闻和传闻填补。2012 年 3 月，有关薄熙来支持者在北京发动政变的传闻甚嚣尘上。媒体被禁止报道薄熙来的情况，外国新闻工作者不能接近关键性人物，公众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的报道。

作为回应，政府镇压相关传闻，关闭了那些被控散布虚假信息的微博账号并逮捕了一些人。这一时期，新浪和腾讯关闭评论功能三天。（中国微博平台比推特更尖端，且允许发表评论。）据官方的《人民日报》报道，政变传闻之后，政府关闭了 16 个网站并拘留了六人，因扩散传闻而被“警告和教育”的人数则没有披露。据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证券市场周刊》的财经新闻工作者李德林在其微博上报道在北京听到枪声后的那段时间曾短暂失踪。自从 2010 年以来，政府不断通过关闭网站的方法发起镇压“不实信息”和传闻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通常目标更为广泛。安徽省东至县委宣传部 2010 年发布了防范和杜绝虚假新闻和信息的内部工作方案。该方案说，“要建立专项巡查制度，对有影响的、敏感的网站进行重点督看，做到及时发现、准确研判、果断处置，坚决查处网上虚假信息，坚决封堵删除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新闻管理制度的有害信息。”按照该方案，任何被认为批评政府的“敏感”网站都可能成为关闭的目标。

随着北京新一代领导人接掌权力，他们将统治的是一个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知情，相互联系和世故的公民。中国民众将不再把政府宣传当作为新闻，而且在政府对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撒谎时，也不会熟视无睹。但是新一代的领导人也有全球最尖端最强大的控制公民获取信息的工具。



《联网者的认可》（也有人翻译为《审查机器的婢女》）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的麦康瑞认为，与其说互联网是推翻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如说互联网事实上可能有利于延长其统治。允许公民进入论坛讨论地方问题，中国领导人既有机会修理大量不满的来源，而且也可以给公民释放不满的出口因而更少要求政治改革。麦康瑞对《华尔街日报》说，“在不必要改变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和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公平交换。”

不过，对于中国那些能够经常上网的人来说，毫无疑问，进入互联网对于人们如何看待新闻及政府，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社会不公平做出反应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在新领导层掌舵之前，公众对新领导人的了解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这类信息正是审查者努力隐藏的。如果没有微博，公众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薄熙来为什么被免职或者他和伍德的关系。最近已经公诸于众的这些丑闻很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但是正如博客作者和言论自由公益人毛对保护记者委员会所说，“即使在严厉且荒谬审查的情况下，微博给予中国普通人一个机会，以‘得知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苏菲·比奇（Sophie Beach）现为《中国数字时代》（英文版）执行编辑，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现住加州伯克利。此前曾任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 2. 虽不明显，但对新闻工作者的法律威胁仍然存在

### 艾德琳

即使中国模拟空间充满对社会不公、政府政策和宣传指示的批评，但是独立新闻和言论仍然被共产党视为明显的政治威胁。当局也利用含糊的法律语言根据发表的内容来迫害异议者，或者完全避开正当法律程序，不起诉或不通知家人就关押批评者。

2010年，一位共产党革命家的儿子纪坡民给数百个联系人发出一封短信询问江泽民的健康问题，结果不经意引发了有关这位前国家主席、且目前仍然是一位权势政治人物逝世的传闻。据纪在接受悉尼先锋早报（Sydney Morning Herald）高西安(John Garnaut)采访时说，几天之后，他被化装为送货员的秘密警察叫到其北京公寓下的街道上。据高西安报道，他们将纪的头蒙住，开车将他拉到郊区一栋别墅内，持续几小时质问他他对江泽民的看法，包括他2003年在网上张贴江泽民捏造革命背景以进入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说法。（高西安说，江的家人已经否认这一说法。）据高西安报道，那些收到该短信的人的住宅都被搜查。

纪是一位党内高官的后代，后来被释放。但引发纪怀疑江泽民背景、较年长的历史学者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2010年底72岁的吕加平从公众的眼中消失。2012年，保护记者委员会获悉，他于2011年5月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亲密同事金安迪。金曾上诉但未获成功，一份翻译的判决书列举了吕最早于2000年和最晚于2010年(此时上述三位人士明显已在拘留中)发表的文章。上诉文件披露了公安局指控他的步骤，包括供应商新浪和网之易提供的电子邮件，和对他的文章扩散情况的分析：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处三大队在国际互联网上发现署名“吕加平”在网址为 [www.maoflag.net](http://www.maoflag.net) 的网站上发表名为“吕加平：拉萨藏独暴乱事件为什么没事先制止”的文章。[……]。2010年9月9日，国际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4个，共计点击浏览2768次，回复12篇。

吕在过去就曾激怒过官方：2001年，他的儿子胡大林因为帮助他在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审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对他报道江泽民越来越多的兴趣，他在2010年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当局检查了十年的网路活动收集对他指控的证据。据国际新闻报道，吕被拘留其家人和朋友均没有被告知。

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公益人常常试图分析中国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以了解什么地方不能越界。但是吕的案子说明，有可能反复越界并违反对内容的限制，即使数年如此，也不会引发刑事诉讼。相反，检方可事后再划定界限，把以往的言论变成犯罪行为。

按照中国的法律系统，批评政府就是企图影响民众。煽动这一词被用来起诉吕加平反政府，在法规中这个词的定义是，“散布谣言或者污蔑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中国法律专家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关键的部分是‘散布谣言或者污蔑’。我认为，‘煽动其他人’并不真正那么重要，实际说来，因为检方并没有必要证明某人被煽动做了某事，或者，如果被煽动的话，[嫌疑犯]采取了措施来做[此事]。”

2013 年，共产党并不始终如一的视批评性新闻为刑事犯罪。但是数字信息留下可以追踪的痕迹--即使发表 10 年之后--仍然被用来作为共产党消除威胁其统治的声音的理由。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的“十年黄金期”，他们俩人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和人权问题讨论进行监视，但是外表开放的迹象掩盖了共产党继续、甚至是加紧打压活动的情况。例如，国务院首次公布了 2009-2010 年和 2012-2015 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些计划缺乏使中国符合国际法规的标准，却在回避某些批评。正如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所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被视为衡量一国政府是否重视人权的一项指标。”

有关言论自由的语言被写成被动式结构“发表意见的权利（被听到的权利）”，这似乎绕过表达意见是否是一种权利这个问题。进一步说，这些计划提到新闻工作者报道的“合法权利”：“合法”这一词汇引入了政府承认的权利与普世人权之间的区别，延伸出来则可能意味着普世人权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

同时，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和作家的纪录在胡温执政期间虽然出现波动，但并没有改变。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调查显示，中国在 2002 年和 2003 年监禁了 39 位新闻工作者，2012 年监禁了 32 位新闻工作者。2010 年，中国十年来首次不是全球唯一监禁新闻工作者最糟糕国家，与伊朗共享这一称号。2012 年则名列监禁新闻工作者第三多的国家，仅位于土耳其和伊朗之后，但与其说这

是中国情况有了改善，倒不如说是因为土耳其与伊朗的情况恶化了。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包括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传送国家机密、煽动动乱、或煽动分裂主义在内的反政府指控在过去十年里，被中国用来作为监禁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理由。

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共产党容忍一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但视另一些为刑事犯罪问题时，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允许批评的前提是，提出批评的人不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组织反政府活动。

获得艾伯特 J.魏德海三世哈佛大学教授荣誉的加里·金（Gary King）支持这种观点。他与别人共同撰写了 2012 年中国网路媒体审查研究报告。该研究说，“与此前认知不同的是，负面、甚至是尖酸刻薄的批评政府及其领导人和政策的贴文并不会更有可能被审查。相反，我们认为审查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消声代表、加强或者鼓励社会动员的评论来限制集体行动，而不是其内容。”该研究发现，中国审查的目标“是一旦出现或预期会出现地方性社会运动，便通过切断社会联系来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为了评估被审查的贴文作者将被逮捕或监禁的可能性，金和他的同事没有研究网路之外“切断社会联系”的问题。金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我们的假设将可能是，与批评政府的人相比，试图发动民众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法律行动的目标。”

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情况变化进一步支持这种观点，政府害怕行动媒体（activist media）超过主流媒体。在保护记者委员会 2012 年调查被监禁的 32 位新闻工作者中，至少 19 位是少数民族，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9 年暴乱后被捕的维吾尔族新闻工作者和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藏族地区 2008 年暴乱后被捕的藏族新闻工作者。被监禁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上升。

在被监禁的 13 位多数民族汉族新闻工作者中，他们的逮捕大多与镇压异议者有组织的示威或有时是与先发制人的镇压相关。例如刘晓波于 2008 年在他呼吁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在网上公布前一天被拘留，虽然最后他因为其他主题的文章被判刑（刘晓波 2010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四川环保人士谭作人与家人一起，收集 2008 年地震中因为利用特别廉价的材料修建的学校建筑倒塌而死亡的学童资料。他计划在地震灾难周年发表其调查结果，但却在计划公布前被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对他的判决是因为他地震前在海外网站上发表见证天安门镇压的文章。在网路匿名号召在中国发动非暴力的“茉莉花革命”之后，陈卫是数十名被拘留的作家和异议人士之一。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虽然其他同时被拘留的人后来被释放后被监视在家居住，但陈卫在外国网站上发表有关民主的文章导致他因煽动颠覆被判九年监禁。

然而，为了判决陈卫、谭作人、刘晓波和其他人煽动颠覆，按照中国法律，并不需要证明他们参与、或者鼓动其他人采取反政府的行动，这就如吕加平的案子一样。法律专家罗助华说，“这种看法仿佛是如此表达可能会引起其他人怀疑政治制度并采取行动予以终结。”

对于不想让新闻工作者发声并恫吓他们的警察与安全人员来说，法律上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可以利用诸如在家或秘密地点、而不是在官方拘留中心拘留等模糊语言来采取行动，且不用通知当事人的家人或法律顾问。

在家软禁和秘密拘留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明显。2011年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通过视频播放包围他家的安全人员，而美联社新闻工作者则在2012年避开安全人员采访了刘晓波的妻子艺术家刘霞。中国法律学者弗洛拉·萨皮欧（Flora Sapiro）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不予通知即进行监视居住已经存在数年。”公有领域正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明。国际知名艺术家和纪录片制片人艾未未2011年失踪43天之后，才允许他妻子在一个既不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住宅，也不是正式拘留中心的地方看望他。除了艾未未之外，作家杨恒均和律师与博客作者许志永当年也分别失踪了数天，引起了地方与国际上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关注。杨在重新露面之后评论说，“当大家谈论我被绑架时，都想到这是政府所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这种关注因为一项加强当局在灰色地带法律权力的动议而增加了势头。201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73条款允许在秘密的地方拘留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犯。虽然要求警方通知嫌犯的家庭是或者不是住宅拘留，但包括在什么地方拘留以及为何拘留等详细情况则仍属机密。（据国际新闻报道，观察家赞扬某些修改，例如为防止逼供，要求对死刑案子的审讯录音。）

修改案仍然保持了原法律含糊的语言特征，这给警方和安全人员滥用职权开了绿灯，很难监视这种滥用职权。据前中国警官和法律专家马海舰2006年发表的文章，秘密拘留被归类为国家机密。虽然警方保留与监视居住相关的数据，但是萨皮欧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这些数据并不公开，“并不告知是否发出通知”或者换句话说，拘留是多么的隐秘。此外，正如法律学者孔杰荣（Jerome Cohen）和陈玉杰2012年9月在香港《南华早报》所写，“实践中，中国执法机关时常扭曲法律条文来便宜行事，即便在法律文义相当清楚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其所做所为有时甚至完全超出法律范围，或与法律直接抵触。”

如果警方不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登记拘留情况的话，则个人完全可以消失。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吕加平和金安迪被监禁的消息直到2012年2月吕加平的妻子于钧艺在家软禁结束后才被外界所知。自从吕加平被拘留后，于钧艺就被在家软禁。新闻工作者高应朴的妻子签署了书面保证不公布他丈夫的案子，因此他从来没有法律代表，也不能上诉。高是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文章批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反腐败运动而被判刑的。他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入狱一事直到几乎两年后他的一位同学在网路上发出呼吁书才曝光的。高的家人与朋友以为他在伊拉克工作。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1日有关新闻工作者被监禁的年度调查，高应朴、吕加平和金安迪仍然身陷囹圄。

有关这些被忽视的案子详情曝光之际，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案通过的时候。不平常的是，修改草案在通过之前被提供给公众征求意见，中国媒体的评价认真而苛刻。据纽约时报报道，八万多民众给予回应，结果修改案中更多压制性的方面被冲淡；先前的修改案将允许警方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可拘留嫌犯高达六个月。但是协商的过程远非完美无瑕。大多数的批评呼吁取消秘密拘留，而不是修改最终纳入修改案的通知要求。

胡温执政期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对传统新闻工作者刑事指控的情况大幅减少。2002年，九位专业新闻工作者被监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是，十年后，在被监禁的13位汉族新闻工作者中，没有一个在传统媒体工作。他们全是因为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而被控。

2004年1月见证了一系列标志性逮捕：广东省受尊重的南方都市报前编辑李民英和该报经理喻华峰因为被捏造的腐败指控被判刑；另外一位编辑程益中也被拘留五个月。由于该报率先发表一系列令地方官员尴尬的消息，普遍认为判刑是对他们的报复。

如今，为了保证主流新闻工作者不出线，宣传官员更多的依靠内部惩戒手段，这包括罚款、强迫休假、降级或解雇等。2011年初，南方都市报的发行人南方传媒集团因为来自宣传部门的压力，迫使资深专栏作家和编辑张平辞职，因张的专栏涉及诸如政治改革等敏感话题。此后张被降级、工作在各出版物之间变动。他被解雇时对《卫报》说，“我被多次告知不要写文章，如果我同意的话，将会得到更多好处。”

今日对专业新闻工作者和他们更为行动性的同事采取的不同政策帮助在这两个社区间打进楔子。专业新闻工作者很少利用国内媒体来强调被监禁的自由撰稿人的案子，尽管有些人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这样做。其中一个例外是国内媒体对博客作者陈平夫有同情心的报道。陈过去当过工人和教师，但失业后为支付健保和其他开支苦苦挣扎，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陈因为在网路上记录包括被警察虐待等不公平的行为而被指控反政府罪。据国际新闻报道，上述报道可能影响到了检方，结果于2012年12月放弃了对他的指控。

同时，只要当局持续利用含糊的法律语言来对言论提出刑事诉讼，主流新闻工作者仍然易受攻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媒体和新闻自由倡导者密切关注南方传媒集团旗下另一报纸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史无前例的反抗。此次反抗是因为地方审查者将该报推动政治改革的新年社论改写为支持共产党的信息。报社职工发出公开信，呼吁免除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的职务并举行了短暂的罢工。支持者们手持呼吁新闻自由的标牌，聚集在该报广州办公室外面；数十个抗议者被拘留。其他一些中国的主流媒体发表了同情的信息，包括普通互联网用户和明星在内的民众也在社交媒体上采取同样行动。

南方周末的示威是新闻工作者与活动家行动的特殊例子，这一行动如果不是统一行动，至少也是平行的行动。网路上的草根报道日益推动传统媒体的日程；为了竞争，商业利益推动平面与广播媒体深挖新闻。如果新闻工作者和活动家相互认同并互相学习，则隐密的执法行动和审查将被报道出来，而此类报道将有助于改变中国公众的思维，并推动领导人采取改革政策。

艾德琳 (Madeline Earp) 现为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研究分析师，其工作范围包括网路自由报告中的亚洲互联网自由部分。此前曾任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她曾在中国和台湾学习中文，并拥有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 3. 中国制造：媒体与审查模式

艾德琳和丹尼·欧布莱恩

作为利比亚网路调查新闻网站 *非洲首页 (Front Page Africa)* 创始编辑，Rodney Sieh 2005 年击败了法律诉讼、监禁与死亡威胁。在面临这些压力的情况下，他仍然成功的将该网站扩张成利比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并因此成为该国新媒体和传统新闻媒体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去年 8 月，他成为 17 位著名非洲新闻工作者和出版人中的一名，受中国政府之邀前往北京参加为期三周的“发展中国家新闻与出版研讨会”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

不过到北京后，Sieh 说他发现参加会议的人既有他称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也有来自诸如乌干达、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对媒体不怎么友好国家的发言人和喉舌”。会议中，一位缅甸的参会者给了他一张名片，上面所写的职务是“媒体审查主管”。Sieh 说其中一场讨论会不是学习如何为报纸筹资和营运，而是充满有关中国媒体模式的宣传，主办者对有关中国媒体自由和政府资助出版的问题回答含糊。他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当然，作为回报，他们期望与会者将撰写或者推广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开放的正面文章。”

中国扩大全球投资的范围，在非洲最明显不过了。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与非洲大陆的贸易至 2011 年已经增加到了 1663 亿美元。2009 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将在 2009 年至 2012 年为非洲提供 100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贸易的增加包括中国媒体在该地的发展。以肯尼亚为例：2011 年 12 月，中国国营的英文报纸 *中国日报* 在内罗毕推出非洲版。此前，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已经从 2012 年初从肯尼亚首都开播，中国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手机新闻服务 *新华社手机报* 自从 2010 年以来已经进入当地，为 1700 万肯尼亚人服务。毫不奇怪，国内新闻工作者看不起这种竞争，即使在并非直接由中国政府支持时也是如此。在中国媒体四达时代 (*StarTimes*) 2011 年获得肯尼亚唯一的数字电视广播执照后，*民族日报 (Daily Nation)* 在一篇社论中质问说，“中国对席卷北非和中东革命的反应就是关闭网站。难道这就是我们在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方面向往的国家吗？”

许多羽翼未丰的媒体面临的危险是，镇压性的政府确实在指望中国，特别是在企图了解如何最佳限制网路媒体能力范围时更是这样。中国这个国家的财富与扩张主义，再加上众所周知中国的互联网如何受到限制与审查，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那些想控制自由讨论的政权的榜样。与其他方法相比，中国对网路媒体的管理对独裁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推动突尼西亚革命的动力部分来自脸书网站 (*Facebook*) 上的活动，该国的领导人选择不封锁脸书（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也在用脸书）。中国不但封锁脸书、推特 (*Twitter*) 和其他外国社交网站，而且还利用这一空缺来鼓励发展类似的国内版网站，如新浪微博（类似推特）和类似脸书的人人网等，这两个网站都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

当穆巴拉克政权 2011 年 1 月关闭互联网时，其作用不但非常有限，相反还促进了更多的街头抗

议并加剧了埃及统治者的垮台。而在 2009 年西部自治区新疆暴乱时，中国成功的关闭了当地——大约七百万用户——的所有互联网服务。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及总编辑萧强说，该行动“主要是防止利用手机和互联网来组织与协调更多的暴乱行动，包括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和新闻的传播。”萧强认为，与埃及相比，其成功主要是当地有大量的军队。“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埃及更多的人走上街头。”不过，中国干预互联网影响的成功，助长了那种说法，即中国方法在其他地方也能奏效。

要了解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不难。中国透过其长城防火墙技术，严格过滤进入其国境的所有网路流量。中国境外的网站，可以整个网站被封锁，也可因出现某一关键词而被封锁单一网页。中国民众是上不了脸书网站的；提到被禁止的精神运动法轮功的网页，无论在哪一个网站出现，也是上不去的。在中国，网页寄存与诸如提供微博网站与聊天室等服务业者被要求删除和封锁许多政治内容。互联网用户被告知这些政策，其方法包括警告非法内容和进入危险网站的直接后果等。

在搜索引擎或网站键入被封锁的关键词将导致最长可达 30 秒的网路中断。虽然不可能封锁每一个被禁的网站信息来源，但是让大多数民众知道自己被监视，再加上严格控制地方媒体，就已经足够限制许多来去匆匆的论争造成的损害。例如，2012 年 3 月，在薄熙来被迫辞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前几天，一辆法拉利车在北京的环路上撞毁，导致一位年青的男性驾车人死亡和两位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一位后来也死亡。虽然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张有关此事件的照片和短讯，但很快就被删除，在网路上搜索法拉利等词汇也被封锁。只有在 7 个月之后，法拉利车的驾驶人是共产党权势高官令计划儿子的消息才再次出现；国际媒体报道说，此丑闻可能使他失去了晋身中国最高层领导成员的机会。

伊朗学者、以伊朗互联网创始人知名的 Siavash Shahshahani 评论说，伊朗政府“全国互联网”计划就是在中国审查的模式上制定的，连接国外网站必须经过一个可控的频道（德黑兰也允诺用户当地类似谷歌电子邮件等类似的服务）。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数字维权活动人士 Sana Saleem 说，巴基斯坦政府最近有关建立能够封锁 5000 万个网站地址过滤系统的计划反映出对“中国和中国如何过滤互联网”的羡慕。不过该计划后来因为国际上的抗议与巴基斯坦互联网自由组织法律方面的挑战而搁浅。越南此前也试图模仿中国的做法，封锁外部网站和鼓励类似的地方网站，例如政府资助类似脸书的网站。

虽然北京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但目前并不清楚中国是否也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中国的公司如中兴和华为是全球通讯设备出口商；华为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其创始人是一位前中国军官，其所有权结构也不为外人所知。据福布斯杂志报道，2012 年 10 月，美国国会指这两家公司具有安全威胁，而此前不久澳大利亚封锁了华为一项价值 375 亿美元建立全国宽频网络的项目。但是尚无证据说明这些公司出口的硬件特别与实施中国监视或审查模式

的工具一起出售。

擅长发展中国家审查的安全研究专家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说，“我们知道华为和/或中兴公司制造路由器和转换器……，而且根据定义几乎就可以说，这是可以进行网际审查的水平。但是我至今尚不知道中国[通过销售定制的硬件或软件]出口长城防火墙的案例。”虽然许多国家现在审查互联网，但全球其他地方的专家至今仍然没有发现使用长城防火墙的特别技术模式，包括其网路中断的特征。中国模式不但要求技术，而且也取决于国有基础设施和私人公司的大量人力投入。虽然缺乏预先包装好的技术，但中国防火墙的成功对其他试图限制互联网的国家却起到了鼓励作用。



甚至享誉新闻自由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也受到中国成功的影响。2010年，该国通信部部长斯蒂芬·康罗伊(Stephen Conroy)在一次有关强制过滤该国成人互联网内容计划的辩论中指出，谷歌应该能够审查 YouTube 上的视频，因为“他们拥有在其他国家按照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命令封锁内容的经验。”作为回应，谷歌澳大利亚公司负责政策事务的主管福林(Iarla Flynn)说，“我们不相信有关中国如何过滤互联网和澳大利亚如何看待该问题的比较有何关系。”但他承认谷歌“承诺遵守我们营运国家的相关法律，”包括当时有关中国防火墙审查的规定。此后谷歌终止了自我审查中文服务的做法，并将其用户引到不受审查的香港网站。

在澳大利亚国内，中文的地方新闻媒体也受到北京的影响。悉尼先锋早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中国记者高西安(John Garnaut)在该报写到，政府拥有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虽然没有在澳大利亚的营运执照，但却通过在当地拥有数家中文报纸的企业家姜兆庆的合资企业大量向当地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传输内容。高西安对秘密电子邮件名单上的中国观察家说，“澳大利亚官僚已经批准，且一些政客已经表示个人支持相当于由中共宣传部和统战部收购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中文媒体。”

现代超级大国总是利用经济和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将其他国家的媒体纳入自己的轨道。美

国政府资助组织长期来支付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新闻工作者接受西方新闻传统的训练。政府资助的机构如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对包括非洲、东亚和澳大利西亚在内的全球媒体市场广播并施加影响。但是与中国国营媒体不同的是，西方输出管道试图在政治和如英国广播公司保证独立的特许状和托管委员会等机制之间保持距离。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西语服务频道的编辑 Hernando Álvarez 2012 年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在过去的 12 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政治干预编辑部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原因非常的简单，即英国社会明白英国广播公司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府，而且皇家特许状和多元托管能够防止任何诸如此类的干预。”设在伦敦的全球新闻频道首席营运官吉姆·伊甘（Jim Egan）说，“我们知道一些政客视英国广播公司为软实力的工具，而且许多对软实力感兴趣的国家如今投资数百万计的资金发展全球新闻频道。英国政客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明白，机构独立与编辑独立是获得国际广播公信力的关键。英国广播公司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新闻不需要听命于政府，政府方面也承认新闻独立的重要性。”中国接触日益增多的风险是自我审查得以出口，通常是整个国有媒体——特别是网路新闻，不再是所谓狂野西部不可审查的声音，而是可以而且应该被政府方面过滤的。

在国际论坛，控制不受羁绊的互联网比倡导限制传统媒体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2011 年，中国在联合国携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俄国，提议制定一项互联网“行为准则”以建立“指引信息空间国家行为的国际标准和规章。”该提议包括一项限制散发煽动恐怖主义……或者破坏其他国家政治和经济和社会稳定信息”的承诺。该提议并没有获得除这几个国家外的其他任何支持，但是俄国与中国，还有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埃及后来联手给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一个将私人手中控制关键性互联网的资源转交给政府主导的国际电信联盟的议案。这些国家共同认为，互联网应该受到严密监视并过滤：即中国模式。在 2011 年中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互联网实行内部审查，这一声明变得更加精准。

中国在全球媒体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加，这如今得力于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资助大国的地位。但是贸易可以是双向的。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口其新闻观：但是其他国家从自由媒体和自由互联网发现的好处可能转过来影响中国国内的变化。越南继续迫害博客，但是于 2012 年放弃了对脸书的封锁。Sieh 在北京见到缅甸媒体审查主管之后仅仅六个月，缅甸宣布将结束此前对国内媒体的审查。该国也大幅放松了先前对海外网路新闻媒体门户的封锁。该决定引发了中国国营媒体的一些不满。倾向民族主义的国营 *环球时报* 警告其读者，缅甸放松内部审查的决定是一个不能效仿的错误。“中国要顺应国家现实的前进，而不应六神无主，让缅甸、越南这样的落后国家成为我们的图腾。”全球的媒体可能日益更多受到北京的影响；但北京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世界其他地方新闻自由的影响。

丹尼·欧布莱恩(Danny O'Brien) 现为电子前沿基金会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国际业务主任。在过去的 15 年, 他一直是网路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公益人。在其祖国英国, 欧布莱恩反对压制性的反加密法, 并帮助给国会议员发传真运动 (FaxYourMP), 推动英国国会更加透明化。他并是伦敦数字民权自由组织开放权利团体 (Open Rights Group) 共同创办人。此前他曾任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公益人、国际业务协调人与保护记者委员会网路公益协调人。

# 建议

## 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 释放所有因公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中国至少监禁了 32 位新闻工作者，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 进行改革使中国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在法律与实践方面符合国际标准。立即终止国家对报纸，广播和其他媒体的审查。
- 终止利用国家安全和保密法来迫害新闻工作者。
- 不要将诽谤罪列为刑事犯罪。改革民事诽谤罪法律，以防止公众人物和企业滥用该法律。
- 停止随意拘留，监视和骚扰新闻工作者。
- 保证地方官员不要因为媒体批评性报道而对新闻工作者施暴。将进行此类攻击的所有人员绳之以法。
- 允许国际新闻工作者进入包括西藏、青海及甘肃藏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采访。不要因为他们的报道而扣发国际记者需要在中国工作的签证或其他文件。
- 取消互联网实名制登记的规定，因为实名制登记将使网路犯罪进一步恶化。
- 批准中国于 1998 年签约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联合国成员之一，中国应该执行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的规定，即“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以及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或通过其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 允许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成立独立的专业组织，因为官方支持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 允许建立独立、私营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新闻频道。

## 给欧盟的建议：

- 坚持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取决于中国证明在新闻自由与互联网自由方面有了改善。
- 将释放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加强与中国外交、策略和商业交往的首要条件，其中

包括新的贸易与投资协议。

- 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应该严密监视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况，并将欧盟有关人权维权人士的原则运用于中国新闻工作者。
- 欧洲议会，特别是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应该密切监视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况，并对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举行听证会。

#### **给美国的建议：**

- 坚持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取决于中国证明在新闻自由与互联网自由方面有了改善。
- 将释放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加强与中国外交、策略和商业交往的首要条件，其中包括新的贸易与投资协议。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应该在双边与多边的会谈中，在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方面对中国领导人施压。
- 美国国会，包括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院外交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应该就中国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情况举行听证会。

#### **给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

- 在双边与多边的会谈中，在人权与新闻自由方面对中国领导人施压。
- 坚持将中国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并在新闻自由方面有明显进步作为其争取在2014年获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的条件之一。

#### **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建议：**

- 考虑通过决议敦促中国改善其在新闻与互联网自由方面的不良纪录并停止长期监禁新闻工作者的行动。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赋予联合国言论自由特别报告人权力，调查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况，向该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相关机构报告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

#### **给国际互联网与科技公司的建议：**

- 参加诸如全球网络协议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对付网路服务监视与审查方面制定出了原则与最佳行为规范。
- 利用用户与服务商之间最新、端对端的安全和加密的连接技术，以限制对服务商就关键字监视和审查的情况。与地方新闻工作者和博客对话沟通，以保证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保护用户匿名和安全。



- 将未来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与中国证明在新闻自由与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进步挂钩。

保护记者委员会

地址：330 7th Avenue, 11th Floor  
第七大道 330号 11层

邮编：New York, NY 10001  
纽约，纽约10001

网站：[www.cpj.org](http://www.cpj.org)

推特：Twitter: @pressfreedom

脸书：Facebook: @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

电子邮件信箱：Email: [info@cpj.org](mailto:info@cpj.org)

电话：212-465-1004